

3-1997

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文化

Xiaohong XI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ltop>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夏曉虹 (1997)。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文化 (CLT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3)。檢自香港嶺南大學：
<http://commons.ln.edu.hk/cltop/3/>

This Paper Serie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論文叢刊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文化

夏曉虹

論文叢刊 第三號
嶺南學院
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一九九七年三月

講 座

題 目：日本明治文學對梁啟超的影響

(Influence of Meiji Literature on Liang Qichao)

講 者：夏曉虹 教授

(Professor Xia Xiaohong)

主 辦：嶺南學院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日 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編務工作人員

主 編：劉靖之博士

執行編輯：鄭振偉先生

助理編輯：李燕美小姐

秘 書：鄧慧華小姐

作者簡介

夏曉虹，1953年生於北京，198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班，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為該系副教授。夏教授涉獵中國古典詩歌、文論，而尤以晚清文學（文化）研究見長。出版著作《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詩界十記》、《晚清文人婦女觀》等。夏教授因研討晚清文學現象之便，旁及該時期的翻譯問題，如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文學（文化）的關係、批茶女士與斯托夫人的一分爲二，以及林紓的文學翻譯對其小說創作的影響等研究，均得到國內外學者的好評。

嶺南學院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論文叢刊第三號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 Copyright by the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Lingnan College, 1997

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文化

夏曉虹

梁啟超於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後，隨即亡命日本，到1912年9月底歸國，在海外流亡的整整十四年中，絕大部分時間居留在日本（除去遊夏威夷與澳洲近一年半，遊美十個月等）。在此之前，梁啟超對日本只有間接了解，他讀過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為此寫下《〈日本國志〉後序》）、康有為的《日本明治變政考》，他所創辦的大同譯書局出版過康氏的《日本書目志》（梁啟超寫有《讀〈日本書目志〉書後》），此外，便只有通過報刊了解一些日本的時事。其中康有為尚未去過日本，日文也不好；黃氏雖任駐日參贊四年多，所述畢竟已是十多年前的情況。像其時大部分維新人士一樣，梁啟超也以日本明治維新作為中國戊戌變法的榜樣，只是由於所知不多、不真切，不免落入他在《〈適可齋記言記行〉序》中描述的“宿學清流，銳意新學，然未肄西文，未履西域，未接西土，隔膜影響，如貧子說金，終無是處”的困境。因此，初到日本，梁啟超非常興奮，《去國行》一詩集中體現了他當時的想法。詩中表明他此行有學申包胥哭秦庭，乞求日本出面援助中國新政的用意（在初到日本不久，10月26、27日，梁啟超曾與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賀重昂有過筆談，提出“深望貴邦之助我皇上復權也”），實際更直接的啓示應該來自明末清初黃

論文叢刊 第三號（一九九七年三月）

◎ 嶺南學院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宗羲、朱舜水乞師日本之舉，但二人未成功。同時，此詩還表達了梁啓超對明治維新的贊揚：“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凌美氣蔥蘢。”在追述了其所經歷的艱難歷程後，梁啓超又表述了他的志願，決心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先驅月照和尚與西鄉隆盛直接參預行動，或者像高山彥九郎、蒲生君平、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那樣成爲新思想的傳播者，即成爲學者式的政治家（“不幸則爲僧月照，幸則爲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陰之間佔一席”）。前一種期望在來日後，通過組織保皇會、籌劃自立軍起義等仍在努力實行，卻終不如後一種期望實現得更完美，對社會更有益。

在梁啓超作爲學者式的政治家活動的時期（我將梁啓超一生以1917年底脫離政界爲分界線，劃分爲前、後兩期），日本明治文化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用《三十自述》中的說法，是“思想爲之一變”。這種變化又是發生在“稍能讀東文”之後。

1899年春，梁啓超曾與羅普一起到箱根讀書。羅自1897年留學東京，此時日文已有相當基礎。於是箱根讀書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梁啓超向羅學習日文。而羅普“本深通中國文法者，而今又已能日文，當可融會兩者求得捷徑”（羅普《任公軼事》），因而創造了一種學日文的“簡法”。經過二人的研討，“訂有若干通例”（同上），由此產生了《和文漢讀法》一書。此書當時流傳廣遠，成爲學日文的速成教材與入門書。梁啓超學到得意處，還寫了一篇《論學日本文之益》，向國人介紹其心得。他號召：“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因爲“待譯而讀之緩而少，不若學文而讀之速而多也”。讀書求“速而多”，學文亦求“速而多”。梁啓超因此向國人鄭重推薦他的《和文漢讀法》：“余輯有《和文漢讀法》一書，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而所得已無量矣。”在《東籍月旦》中，他又用頗具廣告色彩的口吻說：“若用簡便之法以求能讀其書，則慧者一句，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此“簡便之法”正是“和文漢

讀法”（有讀者山陰孫鄭齋投書請教“其法若何”，梁啟超即以此答之）。

“和文漢讀法”的基本要義在“顛倒讀之”一語。所以該書第一節即告誡學者：“凡學日本文之法，其最淺而最要之第一著，當知其文法與中國相顛倒，實字必在上，虛字必在下。”並舉例說：“如漢文讀書，日文則云〔書ヲ讀ム〕。”第八節又總結“其一定之排列法”：“即每句之中，副詞第一，名詞第二，動詞第三，助動詞第四是也。”這種“顛倒讀之”的方法，其實還是來源於日本的“漢文和讀法”。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有介紹：“其旁注一二三及上中下、甲乙丙諸字者，如樂之有節，曲之有譜，則倒讀逆讀先後之次序也。”（卷三十三）梁啟超不過是把被日本學者顛倒了的文法再顛倒過來。

“和文漢讀法”在明治時期確實有特殊功效。因為當時日本很多學者、作家寫作時，都採用仿漢文體。即使是被時人看作“歐文直譯體”的作家，往往也兼用此體，如文章方面的德富蘇峰（杉山平助《文藝五十年史》評為“以歐文脈入漢文調”），小說方面的矢野文雄（其《文體論》自白《經國美談》中“歐文直譯體、漢文體佔三分之二，和文體、俗語體居三分之一”）。這種漢文調，對於日本讀者或許並不好讀，但對中國初學日文者，則提供了很大方便。而且，其時中國“有志新學者”，最終目的還在學習西方。只是因為日本引進“洋學”已取得成功經驗；並且，用梁啟超的話說，“夫日本於最新最精之學，雖不無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論學日本文之益》）；更重要的是，對於渴求新知的中國知識界來說，學日文比學西文在讀書方面見效快得多，因此，學習日本被視為學習西方的捷徑。仿漢文體與歐文直譯體的聯體，也正適應了中國知識界的這一特殊需要。

運用“和文漢讀法”讀日文書的情況，1906年留學日本的周作人日後有追述：

本來和文中有好些不同的文體，其中有漢文調一種，好像是將八大家古文直譯為日文的樣子，在明治初期作者不少，如《佳人之奇遇》的作者柴東海散史（士），《國民之友》的編者德富蘇峰，都寫這類的文章，那樣的鈎而讀之的確可以懂了，所以《和文漢讀法》不能說是全錯。（《和文漢讀法》）

“和文漢讀法”不只是用來讀日文書，還被移用來進行翻譯。包天笑回憶二十世紀初在金粟齋譯書處時所見葉浩吾的譯稿，“他是直譯的，甚而至於就在日本書上鈎鈎勒勒，不再另紙起稿”（《鈞影樓回憶錄·金粟齋譯書處》），可見“和文漢讀法”在中國學界確曾風行一時。梁啟超自知其書“漏略草率殊多”，“訛謬可笑者尤不少”（《新民叢報》15號“問答”），而且，它也有比較大的局限性，對於採用和文體或俗語體寫作的學者與作家如福澤諭吉的作品，便解讀不了。晚清翻譯界譯作的粗疏、錯漏，也與之有關。不過，“和文漢讀法”作為一種語言學習的方法，主要意義不在於它有多大的應用價值，而是從其流行反映了當時中國學界對於西方文化所懷有的普遍熱情與開放心態。

當梁啟超稍通日文，可以自由看書看報時，他有一種發現新大陸的快感，“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論學日本文之益》），“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夏威夷遊記》）。其時，梁啟超借途日本所接受的西方思想文化確實相當博雜，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到1903年才去世的英國思想家斯賓塞，他都有學案或專文介紹其學說（參見宮村治雄的《梁啟超の西洋思想家論》）。大抵日本著譯界每一種流行的新學說，都會在梁啟超的著作中得到反應。不過，正如《日本維新三十年史》（高山樗牛等著）所概括的，“所謂西洋主義若歐化主義”，其影響最著者“凡有三焉，第一為英吉利派之功

利主義”，“第二爲法蘭西派之自由主義”，“第三爲德意志派之國家主義”（第一編“學術思想史”）。梁啟超對這三學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學說都作過介紹，寫過《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盧梭學案》（又名《民約論巨子盧梭之學說》）和《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諸文。這三派在日本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分別爲福澤諭吉、中江兆民與加藤弘之，梁啟超對這三位思想家都有一定的了解，在著作中屢次提及。其中，因切合中國的現實需要而對梁啟超思想發生較大影響的，以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爲主。

以知名度很高的政治家而求學日本，梁啟超一切都求速成。學日文有“和文漢讀法”，這既幫助他迅速接近日本文化，但也限制了他對日本文化的了解。主要閱讀日本人漢譯的西文著作或用漢文調寫作的日文著作，而對難以“顛倒讀之”的通俗文體則敬而遠之，這不能不使他對明治文化的了解有一定的偏差。接受西方主要學說，則靠日本人消化過的譯本、介紹，這既幫助他盡快縮短了東西文化的距離，接觸世界最新學理，也使他對西方文化的理解難以超出日本學者劃定的圈子。

梁啟超如何接觸、理解、選擇明治文化，進而不斷改造自己的思想體系，具體論述請閱《覺世與傳世》第七章“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文化”。下面著重介紹梁啟超之倡導晚清文學改良與日本明治文學的聯繫。

二

晚清文學改良的基本組成部分有三：即“詩界革命”、“文界革命”與“小說界革命”。用梁啟超的話來概括，詩界革命的具體內涵是“新意境”、“新語句”與“古風格”“三長兼備”（《夏威夷遊記》）。這一主張在《飲冰室詩話》中又修正爲“以舊風格含新意境”。

“文界革命”的思想要求以“俗語文體”寫“歐西文思”，其在實踐中的產物，便是梁啓超創造的“平易暢達”、“雜以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的“新文體”（《清代學術概論》）。“小說界革命”的宗旨是以小說作為改造國民性（新民）與改良群治的有力工具，“政治小說”因而成為最受重視的小說類型。總起來看，晚清文學改良以輸入西方文化進行思想啓蒙為職責，為此而選擇了比較容易為大眾接受的形式（風格），如詩的“古風格”，文的“俗語文體”，以及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而梁啓超關於文學改良的理論與實踐，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日本明治年間的文學改良。

關於“詩界革命”與明治詩歌的關係，我所掌握的材料不充分。不過，就梁啓超在《夏威夷遊記》中所舉鄭藻常《奉題星洲寓公風月琴尊圖》詩，並對詩中“全首皆用日本譯西書之語句，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權、團體、歸納、無機諸語皆是也”大加稱讚，顯然是將其作為“三長兼備”的作品來標舉。而梁啓超在《飲冰室詩話》中介紹的許多表現新事物、新知識的詩篇，也與日本明治初期流行的“開化新題歌”題材類同。如梁啓超極為推崇的黃遵憲《今別離》，借用男女相思，分寫火車輪船、電報、照片、東西半球晝夜相反的現象。經過梁啓超的大力表彰，引起新詩人的興趣，以後仿作很多，僅《飲冰室詩話》中介紹的，便有曹昌麟的《今別離》四章、雪如的《新無題》七章等。與《今別離》和《新相思》類似的，還有《新遊仙》詩，是借遊仙描繪新事物。《飲冰室詩話》中記述的有楚北迷新子的《新遊仙》八首及蔣萬里的《新遊仙》二章（對此問題感興趣者可參閱拙著《詩界十記》）。這種詩歌題材的相近，很可能只是處在同一階段的文學必經的過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所撰《日本書目志》卷十一“文學門”中，便專門列舉了明治時期許多流行的詩集、歌集，其中也包括佐佐木弘綱編輯的《明治開化和歌集》等新題歌集。康有為還專門列出“新體詩”一類共七種書，如《新體詩學》、《纂評新

體詩選》等。被梁啟超推舉為“詩界革命”典範詩人的黃遵憲，在創作了《軍歌》二十四章後，還特別寫信向梁啟超詢問“日本所謂新體詩何如？吾意其於舊和歌更易其詞理耳，未必創調也”。梁啟超關於此問題的答覆今日雖不可知，但他所讀過的《日本維新三十年史》第八篇“文學史”中，對“新體詩”有專門論述。其中強調指出了新體詩“欲避和歌之調單格弱，破律將漢語俗語，亦自由牽用”，“惟意義明顯是尚，太過露骨，絕少餘韻”，並肯定了“新時代之思想感情，究非舊時長短歌所能發揮盡致，此新體詩所以卒能風靡天下也”。由於梁啟超日文不夠好，恐怕還不能閱讀新體詩，但其精神要義應是了解的。代表梁啟超詩作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是一篇夾有新名詞、具有新意境的歌行體詩，與日本明治之“新體詩”有相通之處。這首詩寫於從日本至夏威夷的船上，航行於連接亞、美兩洲的太平洋上，時間是1899年12月31日子夜，詩人站在時間、空間的新維度上縱覽古今中外，概述世界進化歷史，宣揚民族競爭意識。這種新歌行體詩在梁啟超提倡詩界革命的初期創作較多，較集中，可視為體現詩界革命真精神的作品。從這些蛛絲馬跡中，我們大致可看出明治新題詩、新體詩與梁啟超“詩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在新名詞的運用、新事物的表現、新意境的創設與詩歌形式的自由化、散文化方面，明治詩歌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如果說，關於“詩界革命”還缺少梁啟超自述一類更直接的材料，來証實其與明治詩歌的確鑿聯繫；那麼，在“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方面，答案則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在文界革命方面，對梁啟超影響最大的人物是德富蘇峰。“文界革命”思想的萌生，即與他有關。1899年底在前往夏威夷的船上，梁啟超讀了隨身攜帶的德富蘇峰著作，在日記中寫道：

讀德富蘇峰所著《將來之日本》及“國民叢書”數種。德富氏為

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

同時還指出：“蘇峰在日本鼓吹平民主義甚有功，又不僅以文豪者。”這與《日本維新三十年史》記“其所唱導，實《民約論》之流亞，平民主義也”（第一編）正相合。所謂“歐西文思”，主要指西方的思想文化。以歐西文思的引進，作為文界革命的起點，恰好反映了文界革命所具有的輸入新思想以開通民智的基本性質。雖然為著啓蒙的需要，梁啓超不斷談到“俗語文體”，以之作爲文界革命的形式要求，但在實行中，由於承載新思想新知識的新名詞與俗語文體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新名詞當時尚未普及，尤其是表現新觀念的抽象名詞尚未融入口語，因而致力於傳播新學的文界革命，便不得不借助“新文體”而不是“俗語文體”來達到目的。而“新文體”在“雜以俚語”與“平易暢達”這些特徵上，仍然與“俗語文體”所追求的通俗化取向一致。最終，經過“新文體”強力灌輸，大量新名詞逐漸在社會生活中得到廣泛使用，現代白話文才得以誕生。而在梁啓超創造“新文體”的過程中，也還是以德富蘇峰的著作作為取法對象。

德富蘇峰的“國民叢書”等書，在明治時期曾風行一時，據馮自由說，是時“彼國青年莫不手握一卷”。在中國留學生中，這些著作也成爲熱門書，“凡涉足彼都之留學生，亦少有不讀過蘇峰著之國民小叢書也”。蘇峰1917年來中國後寫作的《支那漫遊記》中，即記述了曹汝霖和張繼都對他說，當年留學日本時，他們都是“國民叢書的愛讀者”。愛讀的原因，既與其“提倡國民獨立自主之精神”的新思想有關，也與其所用文體有關。在當時的日本讀者眼中，蘇峰作為“新文學界之權威”，是因其採用了“歐文直譯體”，令人耳目一新。中江兆民即指出：“德富蘇峰的直譯法，大概是他自己創造的，一時支

配了日本全國的文壇。”（《一年有半·續一年有半》）顯然是將其作為歐文直譯體的代表作家來評價的。而在留學日本的中國讀書人眼中，德富蘇峰卻是“漢文調”的作者（周作人）。馮自由認為：“蘇峰長於漢學，其文辭只須刪去日語之片假名而易以虛字，便成一篇絕好之漢文。”於是，蘇峰所用的仿漢文體，又為初通日文的中國讀者提供了特殊的便利，用“和文漢讀法”便可以解讀。而在前面我們已指出，“歐文直譯體”與“漢文體”在當時具有歐化思想的作家中，常常是混合使用的。梁啟超對蘇峰文章的愛好，以致效仿，也是兼及內容與形式兩方面的考慮。

梁啟超效仿蘇峰的文章，在一度與他關係密切，後又因政見不同而分手的馮自由筆下有過評述：

蓋清季我國文學之革新，世人頗歸功於梁任公〔啟超〕主編之《清議報》及《新民叢報》，而任公之文學則大部得力於蘇峰。試舉兩報所刊之梁著《飲冰室自由書》，與當日之《國民新聞》論文及民友社國民小叢書一一檢校，不獨其辭旨多取材於蘇峰，即其筆法亦十九仿效蘇峰。此蘇峰文學所以間接予我國文學之革新，影響至巨，而亦《新民叢報》初期大博社會歡迎之一原因也。（《革命逸史·日人德富蘇峰與梁啟超》）

此中所說“大部得力於蘇峰”，有因政見不同而過甚其辭之處。不過，蘇峰對梁啟超影響之大，他本人從不諱言，從其著作中也不難找到根據。

梁啟超的文章，除學術論文外，大致可分三類：政論文，傳記文與雜文。下面分別述之。

誠如馮自由所說，德富蘇峰的影響在《飲冰室自由書》中最明顯，可以說，從內容到形式，都顯露出效仿蘇峰文章的痕跡。與梁啟超“下筆不能自休”的長篇大論不同，《自由書》採取了短小精悍的文體與

任意抒寫的雜文風格。這種寫法雖說與傳統小品文不無關係，但更直接的影響還是來自“國民叢書”中的《單刀直入錄》、《寸鐵集》等短論。德富氏的此類文章，具有直截明快、寸鐵殺人的特點。而長話短說，只從一點切入，或者按而不斷，也成為梁啟超《自由書》的特色。

在《自由書》的“敘言”中，梁啟超已聲明其短文有很大自由度，“或發論，或講學，或紀事，或抄書”。所以，《自由書》中除有三篇標明原作者為德富蘇峰外，還有一篇引起聚訟，被譴責為“抄襲”的《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更能顯示梁啟超對蘇峰文章的效仿。

《煙士披里純》發表於1901年12月《清議報》第99冊，從篇名到基本內容，都取自蘇峰“國民叢書”第四冊《靜思餘錄》中的同名文章，只是略作刪改。此文至多可算譯述，不能視為梁啟超創作。但因梁文發表時並沒注明出處和原作者，此後各種文集、選集都作為梁啟超作品收入，這也說明在文體、風格上，二人確有相似之處。這種抄襲雖然不應該，但在當時以普及新知識新思想為主的時代，人們對“版權所有”並不太看重，思想與文章的片斷借用並不罕見。而到了革命派與改良派政治分野日趨明朗，論爭發生時，文風問題便與道德、政治問題糾纏在一起。如具有革命傾向的《大陸報》便曾發表文章，譏諷梁啟超：

足下之《飲冰室自由書》，如《煙士披里純》等，皆出自日本德富蘇峰君之“國民叢書”中，振筆直書，一字不改，而自題曰任公著。其他各文中如此類者，不遑枚舉。若是則足下不過為新聞記者中之一乞兒、一行竊者而已，竟敢廁身於當世著作之林耶！

（新民之舊友《與新民叢報總撰述書》）

這種借道德批判戰勝對手的做法，在當時還是相當有效的，只是未免意氣用事了些。

《飲冰室自由書》與梁啟超的政論文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其中的短論，常常作為思想火花，在隨後發表的長篇大論的政論文中，得到系統、充分的發揮。因而，蘇峰的影響也從梁的雜文擴及其政論文。如《新民說·論進取冒險》一文中，論冒險精神的產生有四個根源，其一為“生於熱誠”，此段文字，大量辭句來自《煙土披里純》。而借用部分並不顯得生硬或不協調，而是如鹽入水不露痕跡，更可見出梁啟超對蘇峰文章的借鑒已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在梁啟超寫作甚豐的傳記文中，同樣可以發現蘇峰的蹤跡。赴日後，梁啟超的傳記文發生變化，以1901年寫作的《李鴻章》和《南海康先生傳》為標誌，新式評傳取代了舊式的紀傳。而在這一轉變中，蘇峰的《吉田松陰》起了示範作用。

梁啟超初到日本，1898年11月即致書品川彌二郎，詢問：“松陰先生著述及行狀，尚有他刻否？能惠賜一二種，不勝大幸。”其時，德富蘇峰所著《吉田松陰》正盛行，品川所能提供的吉田松陰事跡最好的讀本，應是此作。故梁啟超完全有可能讀過此書。從諸多方面的相似，也可看出其間的影響關係。《吉田松陰》此書最重要的特點是：敘述人物一生的重要事跡時，注意考察時代的變遷。《緒言》稱：“題云《吉田松陰》，其實不過是以松陰為中心，觀察其前後之大勢，潛移默化之現象而已。若使其名實相副，或者改為《維新革命前史論》亦無不可。”書中對吉田松陰一生中重要的活動方面作了專門研究，如《攘夷》、《作為革命家之松陰》等。與《李鴻章》又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以及《兵家之李鴻章》、《外交家之李鴻章》等各章標題對照，不難看出梁啟超對《吉田松陰》一書的借鑒。《南海康先生傳》也分別設立了《教育家之康南海》、《宗教家之康南海》、《康南海之哲學》等專章。即使《李鴻章》一書，最後有重“李鴻章之軼事”的記述，也應該是得益於《吉田松陰》第十九章《人物》中所記述的維新前故老談到的吉田松陰的遺聞軼事。《南海康先生傳》

第九章中也有類似寫法。相似並非偶然。

梁啟超與德富蘇峰這種文學上因緣，十幾年後仍為世人津津樂道。1917年蘇峰訪華，一位中國官員對他說：“您是日本的梁啟超，而梁啟超是中國的德富蘇峰，這是我等同人間的評判。”（《支那漫遊記》）這是對於二人思想、身分（地位與作用）、文風十分接近的最好說明。儘管“漢文調”為梁啟超閱讀蘇峰著作提供了最初的便利，但真正對於中國的文學進程發生深遠影響的，還是“歐西文思”與“歐文直譯體”。在“文界革命”促進新思想的傳播、造成古文體的解體及歐化的白話文的建立上，梁啟超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而這其中也有德富蘇峰的一份功勞。

三

小說界革命是以政治小說為先導而展開的。梁啟超提倡創作政治小說，又是從翻譯日本的政治小說開始的。在亡命日本所乘的軍艦上，梁啟超即閱讀了日人柴四朗的政治小說《佳人奇遇》。三個月後《清議報》創刊，當即設立政治小說欄目，連載梁啟超翻譯的《佳人奇遇》，其後又續刊矢野文雄的《經國美譚》。作為《清議報》僅有的兩個文學欄目之一，又在總共出刊100期的雜誌中連載達69期之多，可見日本政治小說在梁啟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清議報》發表的這兩部政治小說，正是日本政治小說的代表作。到1902年11月《新小說》創刊，在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倡導“小說界革命”的同時，也開始連載梁啟超唯一創作的一部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梁啟超有意借日本的政治小說，改造中國的舊小說，使小說為其改良群治與新民的政治目的服務，這對傳統文學觀念也造成了衝擊（使小說成為“文學之最上乘”）。

其提倡小說界革命的內在理路是：首先強調小說作者為著名政治家或學者。“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譯印政治小說序》）。於是，《清議報》發表上述兩部日本政治小說時，特意在作者名字前面加上“前農商部侍郎”和“前出使清國大臣”的頭銜，以提醒讀者注意作者身分的非同一般。在《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中所稱讚的伏爾泰與托爾斯泰，也屬於這一行列。不再是窮愁潦倒的下層文人，小說作家尊貴的社會地位，即是小說價值的可靠保證。其次，儘量誇大政治小說的社會教育功能。由李頓（Lytton，曾任英殖民大臣，獲男爵爵位）、迪斯累里（Disraeli，曾任英首相，封伯爵）以政治家身分創作的小說，在日本被稱作政治小說。這類小說據說是“寄托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飲冰室自由書·文明普及之法》），迎合了公眾的政治熱情，在明治十年代大受歡迎，因此而出現了把“政治小說尊崇為最上乘的文學”（不知庵主人《讀〈浮城物語〉》）的說法。梁啟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也著重指出，歐洲“魁儒碩學仁人志士”所作具有政治色彩的小說，普及到社會各階層，“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故“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所得出的結論與日本明治年間對政治小說的高度評價正相一致。再次，小說觀念的改變。作為小說類型之一，政治小說既被尊為“最上乘的文學”、“為功最高”，也就連帶改變了整個小說體裁的命運。靠著政治小說的提攜，“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裁也從被鄙棄的“小道”一躍而在文學殿堂中佔據第一把交椅。

梁啟超關於“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的說法，一時成為公論。不難看出，由梁啟超引進政治小說而導致的小說觀念的變革，仍然是借助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只是所載的道改為足以“改良群治”的新思想。《新中國未來記》“緒言”稱：“茲編之作，專欲發表區區政

見。”正是標準的政治小說寫法。梁啓超關於“小說界革命”的論述，基本上是將文學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很大的缺失。不過，觀念的變革並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的說法普遍流行以後，其他繼起的小說類型會逐步糾正獨尊政治小說的偏差，並沖破原先設定的載道要求，使小說藝術的獨立價值得到確認。梁啓超本人始終鍾情於政治小說，對此後小說潮流的演變不以為然，這與其政治家和學者的獨特身分有關（梁啓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家），也與其對日本文學的借鑒，局限於明治初期的文學改良有關。